

汉语史：语言流变研究方法论探讨

裴 文

内容提要 从普通语言学出发,反观汉语史一般性研究,提出系统介入历史比较方法,从语音、结构、词汇三大体系完善共时、历时的自我比对,同时与其他种类语言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比对,所获得的历史比较结果将凸显汉语系统的本质特性及其本真的个性流变规律。

关键词 汉语史 语言流变 普通语言学 语音 结构 词汇

裴 文,南京大学教授 210093

汉语史一般性研究是对汉语系统,包括语音、结构、词汇三大分支系统流变过程所进行的适应性描写和解释。早在二十世纪之前,汉语研究已经深入到汉语语言的各个层面:从《尔雅》可见语义研究,从《方言》可见对方言、土语的记录,从《说文解字》可见词本义的训释,从《释名》可见汉字最初的命名理据,从《广韵》可见音系研究,从《墨子·经上》、《庄子·逍遥游》可见关于语言假定性和社会性的言说,从《夏小正》可见汉语结构规则的分析性话语。王力对先前汉语史研究有一个简短的评价:汉语史作为一门科学,到今天还不算是已经建立起来。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中国历代学者没有能从历史发展的全程上来看汉语的历史,他们只是着眼在先秦两汉;他们没有企图探寻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1]。直至王力的《汉语史稿》(1957)出版,汉语史一般性研究才得以确立。这部著作似乎仍然是当下汉语史一般性研究的主流标杆。

迄今为止,有关汉语音韵、训诂、语法等诸多方面的具体问题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然而,仍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其一,汉语史一般性研究是否已经诞生了描写汉语系统流变的一整套标准语言结构规则?其二,汉语史一般性研究是否已经诞生了解释汉语系统流变的一般规律模式?其三,倘若有,那么,这一般规律模式是否能够彰显汉语系统的本质特性及其流变规律?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一个完备的系统方法论与汉语史一般性研究相适应。本文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尝试从三个路径切入以上问题:第一,汉语系统内部;第二,汉语系统与其他语言系统;第三,汉语系统在空间上的扩展与收缩。

[1]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页。

一、汉语系统内部

研究汉语系统流变的过程离不开断代研究方法或者共时研究方法,同样也离不开历时研究方法。断代或共时研究方法要求对某一时期共存语言现象进行性状的研究和分析,包括同一性、实在性及价值。从汉语语言符号整体出发,指认语言要素之间各个类别、各个层级的关系,从而确保共时研究的有效性和真实性。而历时研究方法则要求对整个语言历史过程先后存在的语言现象进行连贯性的研究和分析。似乎只有当我们能够将每一个共时研究结果有机地串联为线性的延续,它才能够真实表现语言流变的历史过程。以这样的思路和线索推进汉语史一般性研究方法,逐步形成协调而有效的系统方法论。当然,系统方法论具有显在的方向、途径、策略、手段、工具以及操作程序系统的选择,它的有效与否取决于汉语史一般性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汉语史本身的性质决定了汉语史的研究方法。而更为关键的则是,汉语史一般性研究能够准确选择问题。只有真正针对汉语史研究的本质,系统方法论才有可能从理论落实到汉语系统本真。

我们需要在共时和历时两个线索上进行三大系统的比较,即语音系统、结构系统、词汇系统。语音系统的比较对结构系统、词汇系统的比较有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而结构系统的比较对语音系统、词汇系统的比较具有支撑作用。但是,能够从根本上推动语音系统比较和结构系统比较的则是词汇系统的比较。总之,三者不可有所偏颇。

汉语史一般性研究需要追问:作为系统,汉语内部的结构在特定的时间段里有着怎样的特质?就特定的时间段而言,哪些语言现象是流传下来的?哪些是新近诞生的?哪些是新近消逝了的?为什么有些语言现象稳定流传到这个时期而有些却消逝了呢?为什么有些语言现象仅仅只是诞生在这个时期、这个区域、这个社会集团呢?它们与前后链接的时期是有着本质的变化抑或只是表面程度的变化?是颠覆性的变化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个别变化?汉语在整个的历史过程中所凸显的语音、结构、词汇三大系统的流变规律是什么?如此等等,这便有了人们对汉语史分期的探讨与研究。

王力指认汉语史的四个阶段:上古时期(公元三世纪以前)、中古时期(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近代汉语(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现代汉语(二十世纪)^[1]。除此而外,有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序》(1985)以“文言”、“白话”为基准的分期,有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1988)以“社会”、“汉语”、“文字”等为基准的分期,有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1989)以“语法”为基准的分期,有蒋冀骋《论近代汉语的上限》(上,1990)兼顾语音、语法、词汇标准的分期,有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1992)从词汇角度结合语音、语法的分期,有向熹《简明汉语史》(1993)综合语音、语法、词汇等内部要素特点的分期,有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1994)对近代汉语上下限的专门研究,有唐作藩《汉语语音史教程》(2011)以语音为基准的分期,如此等等,这些研究显然已经极大地丰富了汉语史一般性研究。然而,为什么会存在如此不同的汉语史分期呢?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汉语史分期是对汉语系统本质的表达,是汉语史本身阶段性特征的本真呈现,这应该成为汉语史分期的基本出发点。王力提出:“语言的历史分期是应该由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来决定的。”^[2]从理论上来分析,王力的观点没有瑕疵。但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必定会遭遇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什么是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研究者仍在探索争议中,且是见仁见智。而当我们还在追问“什么是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时,却已经将它作为分期的依据,似乎有本末倒置之嫌,对汉语史进行挤压式的或扭曲式的描写与解释便是在所难免的。与此同时,在技术层面仍然存在标准

[1][2]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3-44页,第41页。

化问题。研究者普遍从概念出发,包括“量变”、“质变”、“渐变”、“突变”、“转变”、“汉语发展”、“汉语发展的关键”等等,那么,究竟多大量的变化属于“量变”的范畴?究竟变化到了什么程度属于“质变”的范畴?“渐变”与“突变”的起止时间、空间的界定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语言现象可以被界定为“发展”?什么样的语言现象可以被界定为“发展的关键”?如此等等。恰恰是由于主观的判断多于客观的标准,加之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操作方式,我们这才有了各种各样的汉语史分期。

以历史比较方法可以真实而可靠地采集汉语史分期的事实依据,而这种方法的可操作性则在于全面而有效的观点,即前瞻与回顾。譬如,我们可以考虑采用前瞻性的观点,即按照语言流变的自然先后顺序来进行描写并加以解释。而前瞻性的观点需要有一个扎实的基础,即完备的历史细节。历史文献的空白必定会从根本上颠覆前瞻性的观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准备采用前瞻性的观点,事先应该对每一个历史细节有所了解,至少要能够从当下往回推,即采用回顾性观点。每回推一步,都要问:是什么导致了“当下”的语言状态。有了这样的回顾性观点,才可以对这一“当下”状态进行描述和解释,这便有可能一步步地走入汉语策源地,对汉语的原初状态进行描写并对汉语的存在状态形成一个明确的认识。在足够的共时与历时比较基础之上,再从这个原点出发,带着明确的认识进行前瞻性的描写和解释。因此,先回顾再前瞻,我们对语言的认识才有可能达到完备。一旦采用历时比较方法,我们随便便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汉语在时间过程中的流变凸显了空间的差异性。那么,我们如何认识汉语在共时状态下的种种空间区域变体与历时状态下的时间流程变体呢?我们如何才能够有效地进行区分而不至于将它们混为一谈呢?有了这样的思考,我们似乎才有可能接近汉语史本真的分期。

从可考的记录中获悉,在秦始皇时代,汉民族便有了一次南下大迁徙,大抵是现在的广东和广西,为现代粤方言区域。大约在四世纪,又有一次南下大迁徙,大抵是现在的江苏南部和浙江,为现代吴方言区域。已有大量研究结果表明:汉语在北方区域有着较大的流变,包括语音、结构和词汇。相对而言,离开中原的汉语却在南方相对稳定,更多地保留了中原古音古词。常见的例证有:粤方言中至今仍在通行部分古代词语,如“面”、“颈”、“行”、“入”、“饮”、“食”等,与它们相对应的北方方言词语却是:“脸”、“脖子”、“走”、“进”、“喝”、“吃”等。在当下的北方方言中,这些古代词语只是作为构词成分存留在北方区域,如“面容”、“颈椎”、“步行”、“进入”、“饮水”、“食品”等。从结构上来看,也是如此,例如,北方区域的“他比我有钱”,“我给他两本书”,在粤方言中的相应表达则是:“他钱多过我”,“我给两本书他”。正如王力所说:“就语音方面来说,离开中原越早,保存古音越多。六朝以后,汉语方言更加分歧了。北方是汉语的策源地,北方的汉语无论在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都发展得最快。”^[1]这是汉语史分期研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语言的本质而言,语音是语言流变最为核心的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指认保存古音相对最多、相对最少的空间区域呢?迁徙地如广东、广西、江苏、浙江、江西等空间区域无条件保留古音的可能性是否存在?这些空间区域原本是否就有汉语古音的存在?是“凡语”与“方言”并存?抑或就只有方言古音的存在?就语言本身而言,不存在绝对的不变性,主体表现为时间过程中的流变。从空间区域出发,汉语在南北两个空间区域都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都有可能发生相当程度的流变,它们流变的范围、流变的方向以及流变的形式也都是无从估量的。例如,汉语自北向南的过程中是否与所经过的空间区域方言发生交流?是否夹带着迁徙路线上的方言要素进入南方区域?之后又是否与南方空间区域方言要素发生融合而后分别产生了后人指认的粤方言和吴方言呢?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融合的呢?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确定南方空间区域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更多

[1]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5-46页。

地保留了北方空间区域的古音、古词汇、古结构或者更多地保留了南方空间区域的古音、古词汇、古结构,这是关键所在。这就需要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做深入、细致而系统的共时、历时研究,以语言事实为基础,以空间界定为支撑,只有这样,汉语史分期才能具有合法的依据。

其实,在汉语史领域,历史比较方法并不陌生,然而,就汉语史一般性研究,我们却看到一个致命的弱点:历史比较更多地用于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不是汉语史一般性研究,且远没有达到系统方法论的水准。以王力的“中古的语音系统”为例^[1]。“中古的语音系统”是中古汉语的语音标准,雅言的语音系统,即“切韵系统”。从理论上分析,它是原发性特点与流变性特点融合的一种结果状态,是相对静态的语音研究,属于共时研究范畴。可是,这一研究结果并不充分,至少,我们还可以再做两个向度的延伸:一是基本概念的问题。例如:“四等”与“四呼”。王力认为:“‘四呼’是和‘四等’有对应关系的,而且比较适合于近代汉语的实际情况。”^[2]那么,“四等”、“四呼”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本质差异?它们各自有着怎样的发音位置?它们的口形、舌位、喉部、气流、声调等等都需要有系统而科学的描写和界定。而更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则是:“中古的语音系统”是如何诞生的呢?具有什么样的形成依据呢?为什么在这个系统里“声调”、“声调调值”这两个看似不可或缺的概念就意外莫名地缺失了呢?为什么“书同文而不同音”在这个系统里偏偏就失语了呢?如此等等。没有充分的共时、历时研究做支撑,基本概念如“四等”、“四呼”便缺乏应有的成立理据。另一个则是辩证视角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中古的语音系统”并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个面,而是一个至少历经了八个世纪的流程。这一相对的共时研究成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忽略时间流程中语音流变的绝对存在,无论是潜在还是显在,无论是突变还是渐变,无论是转瞬即逝还是绵延留存。或者说,以共时研究的视角,一切流变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恒定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求得语音价值、语音共存关系,重建“中古的语音系统”的一般原则,解释语音共时关系中的细节状态。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重建的是雅言语音系统。当然,雅言从来就没有抗拒过语音的流变,流变是绝对的,也是必然的,或有规律,或无从预期。只有当我们对“中古的语音系统”进行深入的历时研究,寻求任意流变的语音可能存在的交替、类比以及由此导致的可能的结构变化,继而指认语音要素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而这种转变并没有从根本上切断它的同一性,那么,“中古的语音系统”这一共时研究成果才可能因此具备基本的合法性,汉语史分期研究才可能因为有这样扎实的基础而呈现汉语本真。

汉语本身是一个统一体,它在流变过程中可能凸显阶段性结构规律,将相对集中表现汉语某些共性特征的阶段划作一个时期,具有较强的可操纵性,便于研究者的理论陈述,也更便于学习者了解。然而,归根结蒂,对于汉语本身而言,汉语史分期毕竟是外在的。就迄今为止的汉语史具体研究,我们似乎很容易受制于时间阶段的划分,在不知不觉中,让时间阶段划分遮蔽语言本身流变及其所凸显或所隐含的恒定特征。如果我们能够以开敞的方式,全面引入历史比较方法,或前瞻观点,或回顾观点,或两者结合,深入研究汉语的整个时间、空间流变过程,便可期待获得汉语系统流变的一般性规律。

二、汉语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历史比较

从理论上分析,汉语史一般性研究需要在全球视野之下观照汉语系统,确立汉语系统在世界语言中的存在方式、存在地位,由此指认汉语系统与世界所有其他语言系统之间存在的共性特征,从而发现汉语在语音、结构、词汇等各个分支系统流变的个性特征。

王力指出:“历史比较法是语言的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3],“……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应用历史

[1][2][3]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0页,第70页,第20页。

比较法,就是对汉藏语系诸语言作比较研究,那样做是大大有利于上古汉语的研究的,……关于上古汉语的形态学问题,也要等待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有了满意的结果之后,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1]尽管王力的主张是在汉藏语系统摄之下观照汉语,但仍可见出他对历史比较法的推崇。

以单位名词为例。王力指出:单位名词(量词)也是汉藏语系特征之一。大部分的汉藏语系语言(特别是现代的汉台语群)都具有单位名词^[2]。例如,汉语中的“个”、“只”、“粒”等等,越南语中相应的 *kai l*(cái), *kɔn l*(con), *hət l*(hột)等等。不妨按照王力的方法,在已有的语系理论框架之内,探寻汉语系统中单位名词的特征与规律。但在比较之前,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汉语单位名词的缘起与流变。从已有的可考文献,我们可以观察到汉语单位名词本身的形成有一个明显的流变的过程,即从选择性到规约性。就先秦两汉典籍来看,汉语并没有形成单位名词的系统表现,例如:

负服矢五十个(《荀子·议兵》)。

故鲁人以榘,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荀子·正论篇》)。

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史记·大宛列传》)。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韩非子·五蠹》)。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庄子·逍遥游》)。

如果将魏晋之前看作是一个相对的时间区间,那么,从共时的路径,我们观察到:两种结构,即“数词+名词”,“数词+单位名词+名词”完全处于并存状态。而在魏晋之后,则有两种结构凸显,即“数词+单位名词+名词”,“名词+数词+单位名词”,而“数词+名词”仍有残存,单位名词由此逐渐成为汉语系统中的规约,例如:

邺城毁五层佛图(《魏书·世祖纪》)。

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魏书·世祖纪》)。

印有三字,为龙鸟之形,要妙奇巧,不类人迹,文曰“早疫平”(《魏书·世祖纪》)。

中有三层浮图一所,金盘灵刹,曜诸城内(《洛阳伽蓝记》卷一)。

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洛阳伽蓝记》卷二)。

短梦惊回,北窗一阵芭蕉雨(《刘敏中·点绛唇》)。

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以立军制(《武经七书·唐李问对》)。

就汉语研究汉语,便无从知晓所得出的结论究竟是汉语的个性特征还是人类语言的共性特征。至此,我们可以走出汉语,进入所谓“汉藏语系”。从汉藏语系内部出发,是一种可能的研究路径。在“汉藏语系”语言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种类语言有着各自的结构,主要表现为三种:“名词+数词+单位名词”,“名词+(单位名词+数词)”,“名词+数词”,且明显有别于汉语结构,例如:汉语的“两个人”,彝语是 *tsho³³ŋi³¹ma³³*(人+两+个),土家语是 *no⁵⁵ne⁵⁵xu²¹*(人+两+个),羌语是 *mə³³ŋi⁵⁵la³⁵*(人+两+个),景颇语是 *mă³¹ʃa³¹mă³¹ʒai³³lă⁵⁵khon⁵¹*(人+个+两)或者 *mă³¹ʃa³¹lă⁵⁵khon⁵¹*(人+两),门巴语是 *so⁵⁵ŋo¹³ŋik¹³tsiq⁵⁵*(人+两),等等。

由此,我们观察到“汉藏语系”所属语言之间在单位名词方面存在的差异。有必要指出,就目前的语系研究成果来看,“汉藏语系”本身存在诸多根本性的问题,相对于它属下的诸多种类语言而言,它显然只是外在的强加。而更为科学又符合语言事实的路径则应该是:在“汉藏语系”获得充分论证之前,不拘泥于所谓的“亲属关系”,打破已有的语系理论框架格局,在不同的语系之间、不同的语群之间、不同的语族之间、不同的语种之间建立结构性的链接,展开历史比较,从而获得对汉语单位名词的

[1][2]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页,第34页。

一般性指认。

在世界语言范围内稍加比较,便看到各样不同的结构同时存在,例如:南岛语系马来-波里尼西亚语族的马来语结构为:“数词+单位名词+名词”,如tiga orang polis(三+位+警察),tiga buah rumah(三+座+房子),tiga biji cawan(三+只+杯子),tiga ekor ikan(三+条+鱼)。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西部语支的波斯语结构为“数词+(单位名词+名词)结构,如se kitab(三+书)或者se jeld kitab(三+本+书),se livan ab(三+杯+水),se kilo gušt(三+公斤+肉)。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部语支的德语结构为“数词+名词”,“数词+单位名词+名词”,如drei Bücher(三+书),drei Tische(三+桌子),drei Tassen Wasser(三+杯+水),drei Kilo Fleisch(三+公斤+肉)。至今仍无宗亲归属的日语结构则为:“数词+单位名词+的+名词”,如:三冊の本(san-satsu no hon,三+本+的+书),三人の警察官(san-nin no keisatsukan,三+位+的+警察),三軒の家(san-gen no ie,三+座+的+房子),三匹の魚(san-biki no sakana,三+条+的+鱼),三キロの肉(san-kiro no niku,三+公斤+的+肉),三杯の水(san-bai no mizu,三+杯+的+水)。由此可见,单位名词不只是汉语的一个特征,也不只是所谓“汉藏语系”的一个特征。如果我们能够就“单位名词”将汉语放置在世界语言之中进行共时、历时比较,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成果,那么,汉语中“单位名词”必将获得全面的描写与解释,并为汉语系统流变的规律提供足够有力的支持。

再以王力的结构研究为例。王力指出:主一动一宾的词序,是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词序^[1]。这在迄今为止的汉语研究界都是毫无争议的。他举证海南保亭黎语、越南语等,通过比较,指认它们都与汉语的词序一致,并认为从宾语的位置上来看汉语和侗傣苗瑶比较接近,是有充分理由的^[2]。此前,他特别在脚注中指出:因此,我同意契科巴瓦教授的看法,把汉藏语系分为两个语群,即汉台语群和藏缅语群^[3]。

对此,我们似乎首先需要思考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什么是词序?第二,以宾语的位置来判断汉语与“汉藏语系”中其它种类语言的亲近程度是否有效?

词序首先是一个语音序列,也是语言组织的形式结构,它的价值就在于表达思想,换句话说,我们所要表达的思想正是通过这个语音序列、这个形式结构呈现出来。例如:是这个女生给的那束玫瑰花/是这个女生给那束玫瑰花的/那束玫瑰花是给这个女生的/那束玫瑰花是这个女生给的/那束是这个女生给的玫瑰花/那束是给这个女生的玫瑰花/给那束玫瑰花的是这个女生/显然是完全相同的语词,却因为词序的不同而传达不同的思想或细微的语义差异。也就是说,汉语系统允许多种词序的相对存在,其根本则在于:思想选择词序。词序是对人类思维方式及心理选择的深层表达,应当说,是我们的思想使得我们的汉语词序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每一个词语都具有参与语音序列或形式结构的能力,而这个系统同时又赋予它相对自由的结构能力,使得同样的词语可以有多种可能的序列,这恰恰是语言的生命力所在,自古至今的汉语词序便是佐证,例如: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始计》)。

知国有无之数,用其仇也。知彼弱者,强之体也。知彼动者,静之决也。官分文武,唯王之二术也(《尉缭子·原官》)。

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庄子·人间世》)。

[1][2][3]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3页,第36页,第35页。

正说之间,只见几个小丫头并老婆子忙忙的走来,都笑道:“来了好些姑娘奶奶们,我们都不认得;奶奶姑娘们,快认亲去。”(《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贾母道:“我知道你们今儿又有事情,连饭也不顾吃了。”(《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探春笑道:“你们闻闻,香气这里都闻见了。我也吃去。”(《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以宾语的位置来判断汉语与“汉藏语系”中其它语言的亲近程度是否有效?这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把词序“主语+动词+宾语”看作是汉语及“汉藏语系”中部分语言所独有的区别性语言特征。不妨把研究视野扩大到世界语言范围,以便获得更多的视角、更多的数据。结果我们看到,具有“主语+动词+宾语”词序的语言种类在各个语系中都有存在,也就是说,这种词序广泛分布于世界语言之中,例如:

努佩语:egi-zì gí yīkā tò nākà. (孩子-们+吃+鱼+和+肉)

马来语:Anda jumpa buku ini. (你+找到+书+这)

巴斯克语:Aitak abzuen fabrike aundi. (父亲+拥有+工厂+大的)

法语:Vous connaissez mon père. (您+认识+我的+父亲)

荷兰语:Ik schrijf de brief. (我+写+信)

意大利语:Parla italiano. (说-第三人称单数+意大利语)

波兰语:Nie lubi gotować. (不+喜欢-第三人称单数+烹饪)

英语:I love poetry. (我+喜欢+诗歌)

以汉语以外的语言为参照,只稍作比较,我们便看到“主语+动词+宾语”不是汉语或“汉藏语系”中部分语言所具有的区别性特征,那么,以它作为标准判断语言之间的亲疏关系,似乎有牵强之嫌。我们或许可以尝试观察各个种类语言有怎样的结构组织和思想表达方式,通过历史比较方法,找寻更多的语言事实以及语言所赖以生存的语音及心理数据,由此获得语言结构的一般类型,而后再反观汉语,那么,我们所获得的不仅仅有汉语的结构特点,更有汉语区别性结构特征。

论及汉语系统与其他语言系统的历史比较,钱大昕(1728-1804)是成功的开拓者。他指认: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1]。并举证:古读“文”如“门”,古读“弗”如“不”,古读“方”如“旁”,古读“封”如“邦”,古读“无”如“模”,古读“房”如“旁”^[2]。而他的研究恰恰来自历史比较,他选择了梵语作为参照系,如:梵书入中国,翻译多在东晋时,音犹近古,沙门守其旧音不改,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3]。虽然吠陀三声与汉语四声的形成并没有显在的、直接的勾连,但正是由于吠陀三声的启示,我们的先人指认了汉语中实际存在的声调,并将汉语中的声调归为四声,由此获得对汉语语音策源的本质认识,这才有了历代研究者关于四声看似不同的指认,如王念孙(1744-1832)和江有诰(?-1851)认为古人实有四声;段玉裁(1735-1815)认为古人没有去声;黄侃(1886-1935)认为古人只有平入两声,这与段玉裁的观点没有冲突。黄侃所认为的“平声”实际只是一个大类,倘若细分,则与王念孙和江有诰大体一致。这之后,有陈寅恪(1890-1969)的《四声三问》^[4],有饶宗颐(1917-)的《印度波尔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四声外来说平议》^[5]等等,他们同样采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足见吠陀三声作为参照物彰显了汉语四声的研究。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更多地用在了汉语语音研究,并没有与结构系统、词汇系统

[1][2][3][清]钱大昕:《古无轻唇音》,《十驾斋养新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第99-108页,第106页。

[4]《清华学报》,1934年第九卷第2期,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饶宗颐:《印度波尔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四声外来说平议》,《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有机结合起来,也便没有真正系统地进入汉语史的一般性研究之中。只有当汉语系统与其他语言系统的历史比较是多层次、多方位、多视角的,汉语史研究才有望获得重大发现。

三、汉语系统在空间上的收缩与扩展

我们现在所称的“汉语”是一种自发的语言,它在诞生之时便是特立独行的。在数千年的流变过程中,它在空间上不断地收缩、扩展,不仅发生了自身的裂变与融合,吸收了其他种类语言要素,同时也将自我系统内部的语言要素延伸到其他语言种类。但是,所有这些流变都不曾对它作为独立统一体而存在构成任何颠覆性的影响。

在汉语史一般性研究中,“外来语”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它似乎局限于“借词”,对于汉语史一般性研究,它显得过于薄弱而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我们可以引入历史比较,从三个角度,即汉语在空间上的收缩、汉语在空间上的扩展以及汉语在空间上的回流等研究汉语的流变过程及规律,以此彰显汉语系统的基本特性。

汉语在流变过程中不断遭遇外来语言要素的侵占,形成空间上的收缩,而这些语言要素一经侵入,便以各样的姿态存在于汉语系统之中。以词汇为例:自汉代以来,不断有来自西域、南亚、东亚乃至世界各种语言的要素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入汉语,在汉代,伊朗语 *šarx* (狮子) 进入汉语而成为“师”(北魏的“狮”);在汉之前,梵语 *velūriya* (玻璃) 经由亚细亚进入汉语而成为“璧流离”;汉代爪哇语的 *jambi* (槟榔) 进入汉语而成为“仁频”、“仁宾”,几乎同时,马来语 *pinang* (槟榔) 进入汉语而成为“宾榔”;元代蒙古语 *jam* (站) 和 *jamči* (驿站管理员) 进入汉语而成为“站”、“站赤”驿站。以结构为例,汉语“主语+有+动词+宾语”的结构成为英语结构“主语+have + 动词(过去分词)+宾语”的对应,如:“我有见过他”,“我有吃过早点”,强势挤压汉语原有的结构“主语+动词+宾语”,“我见过他”,“我吃过早点了”。再有一例,汉语“是时候+(主语+)动词+宾语”的结构是英语结构“*It's time* (是时候)+ 主语+宾语”和“*It's time* (是时候)+ *to* + 动词+宾语”的对应,如:“是时候我们自己创业了”,“是时候动身了”,强势挤压汉语原有的结构“(主语+)该+动词+宾语”“我们该自己创业了”,“该动身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尝试全面关注汉语向其他语言空间的扩展,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同时关注汉语在空间上的收缩与扩展。汉语在空间上的扩展,即汉语侵入其他语言系统之中。例如,汉语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不断地波及东亚、南亚,甚至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汉语作为声音符号系统,其中部分要素已经进入朝鲜语、日语、越南语、苗语、缅甸语以及欧洲各种语言而成为它们各自语言体系中的部分构成要素。例如,隋代(602年)汉语随佛经进入日语,“華”(/*ka*/)是古汉语“華”的对音,“心”(/*sin*/)是古汉语“心”的对音,“經”(/*kjɔ*/)是古汉语“經”的对音,“觀”(/*kan*/)是古汉语“觀”的对音,“自”(/*zi*/)是古汉语“自”的对音,“行”(/*gjo*/)是古汉语“行”的对音,“深”(/*sin*/)是古汉语“深”的对音,“時”(/*zi*/)是古汉语“時”的对音,“見”(/*ken*/)是古汉语“見”的对音,“空”(/*ku*/)是古汉语“空”的对音。又如,苗语原本只有十二个韵母,由于汉语扩展进入,中国境内的苗语已经增至二十二个韵母,并且添加了一个声母/*w*/。几乎与此同时,汉语将声母/*l*/扩展进入哈尼语。壮语原本只有“中心名词+限定名词”结构,因为汉语结构“限定名词+中心名词”扩展进入,壮语因此两种结构并存。此外,还有一种汉语流变现象不容忽视,即汉语在空间上的迂回运动。汉语语言要素先期进入其他语言空间,而后又回流到汉语之中。例如,古汉语“經濟”以“经世济民”之意进入日语,却以英语 *economy* (经济) 之意从日语返回汉语;古汉语“大风”进入英语成为 *typhoon*, 却以“台风”回流;古汉语“勞働”以“劳驾”之意进入日语,却以英语 *labour* (劳动) 之意从日本回流。

指认汉语在空间上的收缩与扩展,这只是第一步。我们需要追问这些现象发生的语言学理据,追

索汉语在时间和空间多个向度的延展路径,从时间和空间,从历时和共时,从语音和文字,从同化与异化等等多个方向、多个层面进行系统研究。例如,可以对外来语言要素侵占时期的汉语系统与来源语言系统进行系统的比较,全面指认外来语言要素,包括语音、结构、词汇,追索外来语言要素在汉语及本土各自的历史过程,厘清汉语对比邻区域语言及其他语言要素可能的模仿、同化以及排斥,由此加以音义、结构比对分析,绘制出外来语要素的时间流程图和空间地理图。同时也可以考虑用同样的方法对汉语所进入的不同种类的语言进行相关语言要素音义、结构的比对分析,而后加以构拟。还可以观察汉语语言要素回流路径,它们的运动轨迹及音义变化都可能成为认识某一时期汉语的重要依据。以历史方法获得的研究结果为参照,从又一个角度凸显汉语在空间上收缩与扩展的规律及特性,形成对汉语系统流变规律的一般性解释。

如果我们所能获得的只是片段的、孤立的、零星的语言事实,那便难以构成汉语事实整体,由此所推衍的汉语形态很难具有学理上的稳定性。借助历史比较的方法,我们便可以指认诸多具象、孤立的语言现象,从中推衍一般形态的语言事实。而这些语言事实的不断累积可以构成一个局部完善的整体,这一个个整体最终形成理论上的汉语统一体,其中的每一个局部、每一个细节都是可以获得论证、分析、解释的。汉语史的总体轮廓或将因此而得以清晰映现。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比较的本质规约在于:首先,它必须是系统的而不是片段的或零星的。要就语音、结构、词汇三个方面进行共时和历时的交互比较,当历史比较的结果呈现规律性的相对存在,才能以此框定汉语的存在地位和存在方式,指认汉语系统的本质特征,并由此获得对汉语系统流变规律的一般性总结。其次,它必须是彻底的而不是流于表面形式的。从基本的概念切入,从实证出发,层层推进,衍生理论,以确保所呈现的汉语史是具有内部相互制约结构的,是一环套着一环的,是一层关联着一层的,是有机而富有生命力的,由此完成对汉语语言现象一般性流变规律的解释。最后,它必须终止于形式理论,通过对具体语言事实共时和历时的描写、分析,指认它们各自的性质,并按照性质加以分类、推衍,以确保在完善保存语言事实价值的同时寻找汉语史中以永恒、普遍的方式而存在的要素,从而将所有的历史个体现象归结于一般规律。由此获得的研究成果将参与并丰富普通语言学研究,而被建设和丰富了普通语言方法论则能够激励、完善汉语史一般性研究,并更为广泛、有效地解释汉语个性特征。

〔责任编辑:平 啸〕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tudy of Language Change Pei We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linguistics, the present paper, reviewing the general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puts forward an approach of the system-intervened historical comparison, improving 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self-comparison from phonetics, syntax, and lexicon while making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comparison with other language genres. The results of the historical comparison will highlight the intrins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ystem as well as its unique rules of change by nature.

Key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language change; general linguistics; phonetics; syntax; lexicon